

对罗马共和国的柏拉图式批评

——谈《科利奥兰纳斯》并兼及“荣誉至上政体”

陈 雷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血气”概念深入分析《科利奥兰纳斯》一剧同名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当时罗马的政治、道德环境，揭示这一人物与初生的共和国在性格上的高度一致——两者的灵魂都由血气因素主导；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前者为“爱荣誉的人”，后者为“荣誉至上政体”。在这一政体下，美德被重新定义：勇敢被尊为首要品质，智慧、正义和节制则被忽视。从政治经济角度看，鼓励勇敢的美德是与罗马的对外扩张掠夺政策相适应的，在这一意义上，科利奥兰纳斯的美德作为国家贪欲的工具实际上是罗马政治体内部疾病的一种征象。

关键词 莎士比亚 《科利奥兰纳斯》 柏拉图 罗马 血气 荣誉至上政体

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其早期，是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具有共和倾向的人文主义者在政治和道德上热烈追慕的榜样。关于这个时代，曾对早期现代共和派作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萨鲁斯特有这样一段描述：

罗马最初的体制是王政；……随着岁月推移，它逐步蜕化为无法无天的暴政；于是罗马人改变了国家的制度：他们（废黜了国王）将最高权力分授予两位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仅为一年的执政官。……事实证明，一旦争得了自由，罗马便迅速成长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人们对荣耀如饥似渴；青年人一到年龄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军营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们迷恋盔甲和战

马，而非女色与宴乐；他们不畏强敌，不惧险途，不辞劳苦，勇气让他们能扫清一切障碍。不仅如此，为争取荣誉他们相互间还展开最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渴望在同伴的注视下第一个把敌人砍倒或第一个登上城墙。他们眼里真正的财富是不朽的荣名，他们对它的渴望永远无法满足；至于金钱，他们则只求取之有道，用之慷慨。^①

这无疑是罗马的黄金时代；按照作者的划分，它始于共和初建，迄于布匿战争的终结：“当迦太基被彻底摧毁而罗马在海洋和陆地上都畅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开始（转向）”，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加强了”，贪欲开始蔓延——“它消灭了诚实正直，却代之以残忍横傲”；罗马人的公共精神日益削弱，罗马的共和体制由此走向没落。^②

本文将要讨论的莎士比亚戏剧《科利奥兰纳斯》的故事恰好就发生在萨鲁斯特所描写的这段黄金时期。此时新兴的共和国正不断与邻邦发生战争，而作为从这些战争中脱颖而出的贵族武士阶级的代表，主人公科利奥兰纳斯也具备了萨鲁斯特所称颂的罗马青年的一切优秀品质。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像是一部关于某个黄金时代的作品；相反，整部戏的气氛阴沉严峻，有时甚至有些怪诞。如果说在萨鲁斯特笔下早期罗马更多的是作为腐败的后期罗马的对照物出现的，那么莎士比亚的兴趣则显然更在于从早期罗马的机体中找到困扰晚期罗马的痼疾的最初征象。很多疾病的初起症状是不易觉察的，有的甚至会被认作是机体健康的表现——萨鲁斯特对早期罗马武士的美德就推崇备至；但莎士比亚对此却持保留态度，把这种美德以一个现实人物的形态还原到培育它造就它的罗马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去，让故事本身呈现出其道德评判。至于剧作家给出的究竟是怎样一个评判，这将是本文试图理清的问题。

与莎士比亚其他悲剧人物一样，卡厄斯·马歇斯·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也深深植根于他的性格之中。该剧一开始，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在街头一触即发，此时

^①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The Jugurthine War/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S. A. Handford, trans., London: Penguin, 1963, pp. 179 - 180.

^② 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The Jugurthine War / The Conspiracy of Catiline*, p. 181.

元老院得到情报，说伏尔斯人已经起兵对罗马开战。听到这个消息，平民人心惶惶，贵族们却个个摩拳擦掌，其中尤以马歇斯最为兴奋：“我很高兴，我们终于有机会发泄我们快要变得朽腐的过剩精力了。”^①显然，对于马歇斯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并不是一场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灾难，而战争的好处也不在于它提供了获利和加官晋爵的机会；战争是他们迫切渴望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体内某种“过剩”之物迫切需要通过战争来发泄和展现自己。紧接着，马歇斯进一步说出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特别吸引他的地方：

伏尔斯人有一个领袖，塔勒斯·奥菲迪斯，你们马上就会领教他的厉害。我很嫉妒他的高贵品格，倘然我不是我，我就希望我是他……要是整个世界分成两半，互相厮杀，而他竟站在我这一方，那么我为了要跟他交战的缘故，也会背叛自己的一方：能够猎逐这样一头狮子，我认为是一件可以自傲的事。（《科》：I. 1. 228 - 236）

这是一段不幸成为谶语的自白，马歇斯此时恐怕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真的会与罗马为敌。当然，他最终叛国并非为了要继续“猎逐奥菲迪斯这样一头狮子”，而是因为氓众在护民官的煽动下不念其战功反而将他作为公敌逐出了罗马，但细究起来，这个原因与他在上文中假想的理由其实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获得征服劲敌的快感而宁愿背叛己方的人必定好胜心强，好胜者必高傲，高傲者必易怒；在愤怒和复仇心的驱使下转而与罗马的敌人结盟（“我只是出于气愤，渴望报复那些放逐我的人，所以才到这儿来站在你的面前”[《科》：IV. 5. 82 - 84]）。这样的事发生在以猎狮为乐的马歇斯身上，确也是在情理之中。

当然，如果说马歇斯的覆亡最终要归咎于他某些性格特质的话，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恰恰是这些特质在其命运发生逆转前造就了他的非凡的美德和成功。关于马歇斯美德的本质一位市民在全剧开头就有一针见血的评价：“他所做的轰轰烈烈的事情，都只有一个目的：虽然厚道的人愿意相信那是为了他的国家，其实他只是要取悦于他的母亲，同时使他自己可以

^① 语出该剧第一幕第一场 225 - 226 行。本文所用的全集版本为 F. Kermode, et al. (eds.),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4。后文出自该剧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剧首字及幕次、场次、行数，不再另注。本剧引文使用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年，略有改动。

对人骄傲；骄傲便是他的美德的顶点”（《科》：I. 1. 36-40）。事实上，马歇斯的高傲和勇敢看起来似乎是没有边际的：高傲使他越加勇敢，而因勇敢获得的战功越大，他也就变得越发高傲。全剧开头冷眼旁观的护民官就已经嘲讽他发起怒来会教训天神和月亮，可此时他还尚未成就平生最大的功绩，即单枪匹马攻入伏尔斯重镇科利奥里，为自己赢得“科利奥兰纳斯”的美名。随着他的荣誉和骄傲在短时间内进一步上升，他与平民的矛盾也迅速激化。民众的不满原是指向整个贵族阶级的，但由于马歇斯从不掩饰他对平民的蔑视和憎恶，民愤的矛头逐渐完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罗马的内斗一时间成了整个平民阶级与马歇斯一个人的决战。

对这样一种决定了他一生起落成败的鲜明性格，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实质。这里首先要问：他身上体现出的那一系列显然相互关联的特点是否可以归结到一种更为根本的、植根于灵魂的因素或材质上？在这个问题上，与《科利奥兰纳斯》一剧关系非常密切的《雅典的泰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科利奥兰纳斯》写于1607至1608年间，一般认为与《雅典的泰门》几乎同时；^①而在莎士比亚取用了大量素材的普鲁塔克《名人传》里，科利奥兰纳斯与《雅典的泰门》中的重要角色艾西巴第斯又恰好是作者专门并列并详加比较的两个人物。鉴于两剧在这些方面的亲缘性，本文将尝试把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泰门和艾西巴第斯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柏拉图“血气（spiritedness）”概念的化身，运用到对《科利奥兰纳斯》一剧的解读中来。^②

在柏拉图的体系中，血气首先指的是灵魂的一个构成要素（另两者为理性与感官欲望）。这一要素的最大特点是爱荣誉和爱胜利，它经常以“愤怒”的形式示人；由于它生性鄙视卑琐的感官欲望（appetite），在道德生活中它常常充当理性的盟友，帮助后者完成对欲望的驯服和约束。科利奥兰纳斯的性格与血气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好胜、易怒等血气定义中的关键词就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关于该人物的性格肖像画。其次，血气还被用来指称灵魂由血气主导的人；由于人的灵魂与合众而成的城邦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前者不过是缩小的城邦，而后者则可以看做放大的灵魂），灵魂中的三个要素都可以在城邦中找到它们的对应物：理性和感官欲望分别对应着君主与平民，而城邦中的血气因素

① See A. D. Nuttall, *Timon of Athen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p. xix.

② 陈雷《“血气”的研究——从柏拉图哲学的角度看〈雅典的泰门〉》，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第76-90页。

则是担当着城邦守卫职责的贵族武士。同灵魂中的血气一样，城邦中的血气也是一种既有大用又十分危险的因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有深刻论述：由于血气使人勇敢无畏，优秀的战士必须具备血气旺盛这一条件；但血气旺盛的人天然富于进攻性，这一特点又使得武士很难与他人和平共处。“生就如此性格”，柏拉图问道，“他们怎么能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或者跟其他人发生冲突呢？”^①

这一担忧在科利奥兰纳斯身上得到了灾难性的验证：这位主人公无疑是一个令所有罗马的敌人望而生畏的战士，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让罗马人自己都感到害怕的人物。前文已谈及他与民众的冲突，这其中固然不乏社会经济上的原因，但他对平民的蔑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发自“血气”内心的对“感官欲望”的鄙夷。他指责平民怯懦、无耻、易变、好利，这些都是人们想象中“乌合之众”的一般弱点，但有几处地方他的矛头却是更具针对性地指向“appetite”这个概念的——如“你们的欢心就像一个病人的口味，只爱吃那些足以加重他病症的食物”（《科》：I. 1. 178 - 179）；“让他们不要去舔那将要毒害他们的糖蜜”（《科》：III. 1. 156 - 157）^②。事实上，科利奥兰纳斯灵魂中的血气越纯粹越旺盛，他对平民这一城邦的“胃口”的敌视也就越没有缓和的余地。

那么我们该上哪里去找一种既温和又暴烈的人——对敌人凶狠，对同胞温和——来充当城邦的卫士呢？柏拉图从狗的性格中看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性：“狗看见陌生人就怒吠，虽然这个人并没有打它；而当它看见认识的人，就摇尾欢迎，虽然这个人并没有表示什么好意”（《理》：376a）。在剧中，关于狗的比喻曾两度被用在主人公的身上：全剧开头就有一位市民称他为“一只与百姓为敌的恶狗”（《科》：I. 1. 28）；后来，在同勃鲁托斯谋划如何斗垮马歇斯时，护民官西西涅斯信心十足地说，要激怒这个傲慢之人去与群众为敌会“像唬使一群狗去咬绵羊一样容易”（《科》：II. 1. 256 - 257）。一条素质如此出众的狗最终却没能成为良犬，对此应负首责的当然是他的母亲、那位一手造就了马歇斯的美德的伏伦妮娅。第一幕中伏伦妮娅曾颇为自豪地向朋友夸赞马歇斯的幼子说：“他更愿看刀剑听鼓声，而不愿见教书先生的面”（《科》：I. 3. 55 - 56）；我们不难想见当年伏伦妮娅是如何培养马歇斯本人的。这是一种严重失衡的教育：它给了他最

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页（375b - d）。后文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出书名首字和标准版页码（Stephanus number），英文本为 Plato, *Complete Works*, J. M. Cooper, D. S. Hutchinson, ed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中译本页码不再标出。

② 他还把民众比作“疥癣”：“...rubbing the poor itch of your opinion/Make yourselves scabs”（《科》：I. 1. 165 - 166），而柏拉图也常把“痒”（itching）和“搔痒”（scratching）作为官能快感的例子，see *Gorgias*: 494c, *Philebus*: 46a。

好的作为军人的训练，但却没有在他的灵魂中培育起足以驾驭其血气的理性因素。当然，这种教育中也并非全无“哲学”内容；当马歇斯就要踏上流亡之路时，他安慰前来送别的母亲：“您常常说，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风平浪静的海面，所有的船只都可以并驱竞胜；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时，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科》：IV. 1. 3 - 9）。这些都是塞涅卡的著作中经常可见的格言，但斯多葛派关于人类皆兄弟、应互敬互爱的教诲——这一教诲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谎言”，对驯服凶猛的血气至关重要。（《理》：414d - e）——却没有被提及。事实上，伏伦妮娅在教育中非但没有着意遏制马歇斯灵魂中暴烈的进攻性，反而鼓励其子把对付敌人的手段运用到对付“朋友”上来。第三幕，科利奥兰纳斯与民众间的冲突进入关键时刻，为了避免于己不利的摊牌，伏伦妮娅试图说服儿子掩藏起真实感受，放下身段，去向护民官道歉。对于马歇斯这样一个爱荣誉重于爱生命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伏伦妮娅却能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了避免把自己的命运作孤注，你会用温和的言语去招抚敌人的一座城池，那么对罗马民众使用这样的手段，对于你的荣誉又有什么损害呢”（《科》：III. 2. 58 - 61）？理性本应教导血气爱护城邦里的同胞，但在马歇斯成长中扮演着理性角色的母亲却教育儿子把同胞看做是“敌方城池”那样或需强攻或需智取的对象。这种教育的后果是不难预料的，但当血气把团结友爱（unity and fellowship）的理念当做谎言抛诸脑后时，罗马社会距离真实的分裂和动荡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

不过马歇斯并未涵盖罗马血气因素的全部特点；在剧中，作者还通过米尼涅斯这个人物刻画了贵族阶级的另一侧面，而这也是萨鲁斯特的描述中未曾触及的。米尼涅斯在剧中最要紧、也是最令人难忘的表演当然要数第一幕第一场中的“肚子演说”了。为了平息民众骚乱（其直接原因是饥荒期间百姓严重缺粮而贵族却大量囤积谷物居奇牟利）并为元老院的种种自私行为辩护，米尼涅斯作为本阶级的代言人站了出来，给聚集在大街上的民众做了一篇关于政治体各部分间相互关系的演说。演说是围绕一个关于肚子（对应于元老院）和身体其他器官争吵的寓言展开的——这些器官联合向肚子发难，申斥它无所事事，只容纳食物，不知分担劳苦，而它们——眼、耳、脑、脚——却各有司职，“共同应付着全身

的需要”；对此肚子从容答道：

不错，朋友们，你们赖以生活的食物，是由我最先收纳下来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是整个身体的仓库和工场；可是你们应该记得，那些食物就是我把它们从血液的河流里一路运输过去，一直传达到心的宫廷和脑的宝座；经过人身百窍，最强韧的神经和最细微的血管，都从我得到保持他们活力的资粮。你们……虽然在一时间不能看见我怎样把食物分送到各部分去，可是我可以清算我的收支，大家都可从我领回食物的精华，剩下给我的只是一些糟粕。（《科》：I. 1. 130 - 146）

这是一篇颇能迷惑人的演说，至少起先还确信道理在自己一边的“市民甲”在听完这番话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肚子“回答得有理”。不过仔细想来，米尼涅斯的辩护其实似是而非。肚子的确有其特别的职守，在这一意义上，其他器官对它的指责确实站不住脚；但是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元老院在政治体（body politic）中的地位是否应该与肚子在身体中的地位相提并论。米尼涅斯的演说中有一个疏失很能说明问题：当他讲到肚子把食物的精华传送到心、脑时他的原话是“to the court, the heart, to th' seat o' th' brain”；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是把心看作身体的宫廷所在地、把脑看成端坐在宫廷宝座上的王者的，而这就无异于否定了元老院在政治体中占有权威地位；这显然是自己给自己拆台。在米尼涅斯的上述故事讲到一半时，“市民甲”曾不耐烦地插嘴道：

那戴着王冠的头，那视察一切的眼睛，那运筹帷幄的心，那胳膊——我们的兵士，那腿——我们的坐骑，那舌头——我们的吹号人，以及其他在我们这个机体里各尽寸劳的属僚佐贰……要是他们受制于饕餮的肚子，受制于身体里这样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科》：I. 1. 115 - 122）

有学者指出，与米尼涅斯的寓言相比，这位市民关于政治体构成的表述反倒“更符合早期现代政治话语中对身体隐喻的用法”^①；对于这一点米尼涅斯自然也心知肚明，但由于他必须要为统治阶级积聚大量财富这一事实做出辩解，他能选择

① A. Hadfield, *Shakespeare and Renaissance Politics*,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4, p. 174.

的器官便只有同样具备这一特征的肠胃了。肠胃很难与口腹之欲摆脱干系，而如果一国的权力中心与私欲难解难分，那么这个国家在内政上必定会出现重大麻烦。在剧中，米尼涅斯如簧的巧舌确实弄昏了氓众的头脑，但对于更为清醒的观众而言，他的演说起到的效果与他的初衷却是背道而驰的：他没能为元老院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辩护，却在无意中清楚地揭示了罗马的问题所在。有学者认为米尼涅斯关于肚子的寓言实际上是“对柏拉图政治体三分模型的扭曲”^①。如果说“市民甲”的替代版本是一种更接近于柏拉图理想的模型的话，那么莎士比亚把这两种模型并置在观众面前，其目的似乎是要表明，正如伏伦妮娅的教育已远离了柏拉图的原则，同样以柏拉图的标准来衡量，罗马政治机体中的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早已不在它们应该处在的位置上了。

元老院本应是智慧和血气的所在地，现在却下降到了政治体的腹部，个中原因当然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以及随之滋长起来的贪欲。在罗马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贵族阶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科利奥兰纳斯》的第三幕，主人公曾为贵族多占谷物辩护：“[平民]以为谁也不会把它从他们的嘴边夺下来，所以也从来不曾为它出过一丝劳力。……要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懒得连城门都不肯走出；到了战场，他们只在叛变内讧上表现得勇敢；像这样的功绩，是不该把谷物白白分给他们的。”（《科》：Ⅲ. 1. 120 - 127）科利奥兰纳斯的说法当然带有强烈偏见，但其中确也反映出一些真实的情况；用 A. D. 纳托尔的话来总结，我们在《科利奥兰纳斯》一剧中看到的：

……是一种被城邦的军事成功扭曲了的经济。罗马的财富不是由诚实的耕作者创造的，而是通过一次次对外战争从被征服国那里以贡赋的形式夺来的。科利奥兰纳斯身处社会最上层，但他在经济上并不依赖于下层人民的劳作。作为一个高效的杀戮者，他事实上是罗马主要的财富创造者。相反，倒是罗马平民看上去游手好闲，日益成为寄生在战士们的武德之上的乌合之众。^②

纳托尔概括的这一财富创造模式在第一幕第五场和第九场都有所表现：在前者中我们看到的是普通士兵乘乱抢夺战利品（《科》：I. 5. 4 - 8），而到了后一场，罗

① Unhae Langis, "Coriolanus: Inordinate Passions and Powers in Personal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in *Comparative Drama*, 44. 1 (2010) p. 20.

② A. D. Nuttall, *Shakespeare the Thin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96 - 297.

马军已大获全胜，主帅考密涅斯正在按照战功的大小分配虏获的财物；功劳最大的当然是刚赢得“科利奥兰纳斯”美名的马歇斯，他得到的份额是所有战马和珍宝的十分之一，并可以在其他人之前随意选取（《科》：I. 9. 31 - 36）。面对这一荣誉马歇斯却格外谦虚：“恕我拒绝你的盛情，我愿意和参与这次战役的人分受同等的待遇。”（《科》：I. 9. 38 - 40）随后在罗马举行的表彰仪式中，马歇斯的这一举动被考密涅斯作为他高贵品质的又一明证特别举出：“他拒绝我们分给他的战利品，把一切珍贵的宝物视同粪土；他的欲望比吝啬者的度量更小；行为的本身便是他给自己的酬报。”（《科》：II. 2. 124 - 129）

在马歇斯这样的行为中，萨鲁斯特看到的是共和国战士蔑视金钱的高贵——“他们眼里真正的财富是不朽的荣名”。不过我们不应忘记，在上述场景所再现的事件中马歇斯的真正角色是“高效的杀戮者”，而其社会经济功能是为罗马创造大量的财富。换句话说，尽管物质利益是马歇斯们最不看重东西，但恰恰是这些纯血气的战士，通过他们的勇敢，在客观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和助长了罗马的集体性贪欲——或者套用米尼涅斯的比喻说，填饱了罗马的“肚子”，并进一步刺激了它的胃口。这些战士视财货如粪土的品格只是历史的聚光灯有选择地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在灯光之外的暗处，卑下的物欲却随着罗马一次又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在贵族阶级中迅速滋长。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罗马社会普遍的道德观也是颇值得我们反思的，考密涅斯在嘉奖科利奥兰纳斯时说：“勇敢是世人公认为最大的美德，有勇的人是最值得崇敬的。”（《科》：II. 2. 83 - 85）由于罗马的贪欲需要这些武士的勇敢来满足，罗马对这一品德的依赖程度恰恰可以反映出罗马在贪欲的泥潭里陷得有多深。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利奥兰纳斯的美德其实是罗马政治体内部疾病的一种征象。

由于其尚武好勇的性格特点，科利奥兰纳斯很自然地成为了罗马城邦中血气因素的代表人物；同样，当莎士比亚选择让米尼涅斯来为血气因素的下移倾向做辩护时，他也在这个人物的性格中加入了一些与这一倾向非常一致的特点。作为罗马肚腹的同情者，米尼涅斯对自己及他人肚腹的感受也表现出格外的关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出现在第五幕，此时科利奥兰纳斯带着复仇的军队已兵临城下，考密涅斯前往劝说未果，米尼涅斯对其失败的原因及应当采取的策略做出了如下分析：

也许考密涅斯没有找准时机，那个时候他〔科利奥兰纳斯〕还没有吃过

饭；一个人在腹中空虚、血液未暖的时候，往往会噤着嘴生气，别人不易得到他的布施，他也不易宽恕别人的过失；可是当我们把酒食填下脏腑，使全身的血管增加热力以后，我们的灵魂就要比未进饮食前温柔得多了：所以我要留心看着他，等他餐罢以后，方才向他提出我的请求。（《科》：V. 1. 50-58）

这段话事实上包含了米尼涅斯关于肚腹、血气和理性间关系的一整套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人体内部的权力顺序并不是从上到下安排的；相反，他认为理性受制于血气（生气时更不易宽恕人），而血气最终又受制于肚腹（美食下肚，愤怒就会平息）。在这一意义上，肚子尽管地位低下，但在人体中就好比城邦里的元老院，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显然，米尼涅斯的这种看法与血气的自我认识是截然相反的；关于这一点第四幕中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此时科利奥兰纳斯已被逐出罗马，愤怒的伏伦妮娅对造成这一局面的护民官正大发雷霆，米尼涅斯上前劝解道：“您已经骂得他们很痛快；凭良心说，您没有冤屈他们。您愿意赏光到舍间吃晚饭吗？”熟悉米尼涅斯身体理论的人当然知道，请她吃饭是为了给她消气，但后者却断然拒绝道：“愤怒就是我的食物；我要在饥饿中吃光我自己（Anger's my meat; I sup upon myself, / And so shall starve with feeding）。”（《科》：IV. 2. 50-51）血气似乎是不需要任何食物的，伏伦妮娅如此，她儿子也是如此——J. 阿德尔曼注意到科利奥兰纳斯屡次把食物与毒药联系起来并宣称为了尊严宁愿饿死也不从平民那里乞食。^①事实上，这位英雄非但不需要食物，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看（《科》：II. 2. 116-118），他甚至不需要任何休息和外物支援来完成胸中的血气驱使他去做的事情，就此而言，血气几乎是被认为可以独立于物质而像神一样自足存在的。

导致米尼涅斯与科利奥兰纳斯这样的血气型人物在身体问题上产生如此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年龄和健康状况。对于科利奥兰纳斯，米尼涅斯是个父亲辈的人物，身体的衰老必然会造成血气的衰弱；随着血气对身体的控制力减弱，身体因素对理性和意志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力反而增强了。米尼涅斯自称是一个“humourous patrician”（《科》：II. 1. 47），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体内的四种“体液（humours）”影响的人。与轻如火焰的血气（spirit）不同，体液是滞重的物质；它生成于脏腑，与摄入的食物和营养有着密切的关系^②——从

① See J. Adelman, *Suffocating Mother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49.

② 对这一理论的简述见 Robert Burton, *Anatomy of Melancholy*,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1, pp. 147-148.

这个角度看，米尼涅斯对食物和肚腹的兴趣归根到底是他血气衰弱的一个结果和表征。事实上，我们不妨把科利奥兰纳斯和米尼涅斯分别看成是同一个贵族战士在血气旺盛期和血气衰弱期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性格的化身（就好比泰门与艾西巴第斯互为补充）。关于这两种性格的特征我们的先哲曾有精辟的总结：“……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米尼涅斯虽未见执迷于“得”，但他对肚腹欲望的同情却是与正在罗马滋长着的贪欲同源同质且相互呼应的。

三

血气的扩张势必会引发平民阶级的猜忌和恐惧，平民当然不会坐视自己的空间被不断挤压。贵族对平民的鄙视是根深蒂固的，科利奥兰纳斯曾破口骂这些日益不安分的下等人为“多头的群众（the many-headed multitude）”（《科》：II. 3. 15 - 17），后来双方的冲突加剧，科利奥兰纳斯在对自己贵族同僚的抱怨中再次拾起这一称呼：“为什么你们会允许这多头蛇怪选举出一个官吏，让他来代替自己发言”（《科》：III. 1. 91 - 93）；到第四幕，科利奥兰纳斯被放逐，在与亲友最后告别时，他又说：“就这样分手吧；那多头的畜生把我撞走了。”（《科》：IV. 1. 1 - 2）从其出现次数看，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有必要探究一下蕴涵于其中的哲学内容。这一意象在莎士比亚同时期作家的笔下并不鲜见，^① 不过最早赋予其以哲学涵义的则还是柏拉图本人。

在《理想国》第九章，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正义与非正义灵魂（城邦）间的差别，苏格拉底邀请对话者一起来“为灵魂塑一尊像”。由于其三分的结构，灵魂的塑像必定是某种形式的复合体：“它很像传说中描写的怪物”——比如 Chimera、Scylla 或 Cerberos——“其身体是由多种不同天性的动物长在一起而形成的”（《理想国》：588c）。构成灵魂的第一种动物“是一只多头巨兽，这些头可以随意生长变化，它们有的驯顺，有的则十分狂暴”（《理》：588c）；第二种动物是狮子，它身量较小，但性情凶猛；第三种是人，他更小，但却是唯一拥有智

^① Thomas Elyot 在《治人者》中曾把雅典民主比作“多头的怪兽”；在其影响甚广的蒙田译本里，J. Florio 把原文中的“暴民”发挥成了“多头怪兽般的大众”；这一形象也曾出现在锡德尼的《阿卡迪亚》中。这几位作家都熟读柏拉图，而他们的著作也都为莎士比亚所熟悉。see John Dover Wilson, ed., *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 Cambridge: CUP, 1960, p. 188; J. E. Hankins, *Backgrounds of Shakespeare's Thought*, Hamden: Archon Books, 1978, p. 184; R. Kimbrough, ed., *Sir Philip Sidney: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p. 421.

慧的动物（《理》：588d）。为了完成这一塑像，我们需要把这三种动物合而为一，“然后再给这一联合体造一个人形的外壳，让不知底细的外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单一的生物”（《理》：588d）。当然，它只是看起来像单一体，而实际上由于三者性情悬殊，它们很难自然地和平共处。因此为了灵魂的健康，这个复合体中富于技艺和智慧的“人”的部分必须得到加强：“我们应当确保让灵魂内的‘人’成为完全的主宰；他应当像牧人照看牲畜一样管好那多头兽，饲养和驯化那些较温顺的头，同时抑制那些凶暴的头的生长；他还要把狮子变成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看好各部分，使三者能够和睦相处。”（《理》：589a-b）这一和睦相处的局面就是灵魂的“正义”状态；反之，如果三者间的友谊无法保持，灵魂就会因内部纷争而变得“不正义”。不义的灵魂内的“人”必然是“饥渴虚弱”的（《理》：588e），而一旦人被弱化，灵魂的主导权就会旁落到两只缺乏理性的野兽手中。不难想象，多头兽此时会开始蠢蠢欲动、滋生反心；而那狮子由于失去调教也会变得危险起来；于是，敌意将取代友谊，两只野兽将相互撕咬残杀，最后同归于尽。

多头兽虽然远大于狮子，但在与后者的角力中它却并非天然占有优势，在《科利奥兰纳斯》的开头，尽管民乱来势汹汹，但贵族的代表米尼涅斯一出场，仅三言两语就把一大群乌合之众打发回家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何却如此不堪一击呢？第二幕中一位市民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许多人都叫我们‘多头的群众’，不是因为我们的头发颜色各异，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分歧不一。我在想，要是我们各人所有的思想都从一个脑壳里发表出来，它们一定会东西南北往四下里飞散开去。”（《科》：II. 3. 18-24）^① 各头间意见不一，多头实际上就相当于无头。但如果这只巨兽的身体能被嫁接上一个足智多谋的新头，以统一的意志号令全身肢体，那么凭其巨大的身量，多头兽必定会超越狮子成为政治体中最举足轻重的部分。在罗马历史上，护民官的设立（事见《科》剧 I. 1. 215-221）就恰好相当于给平民阶级这一巨兽安上了一副有谋有断的头脑。通过护民官，平民获得了否决元老院意旨的权力。从此以后，谁要问鼎权力的巅峰，谁就必须先学会如何取悦于大众。尽管像科利奥兰纳斯这样的孤傲之士终会以逢迎下人为耻，但在以后的罗马历史中，我们将会看到很多贵族出身的精明政治家为了实现个人政治野心不惜通过牺牲本阶级的利益来赢取民众的欢心。用柏拉图的术

^① 马基雅维利和李维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see N.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pp. 227-228.

语来说，这相当于政治体中的“人”与“多头兽”联合起来与“狮子”作斗争。虽然这并不是柏拉图理想中的结盟方式，但在现实政治中，这却不失为一种通往新的权力平衡的可能途径。事实上，在共和末年，新的平衡确实是通过以恺撒、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为首的“平民派（populares）”战胜以庞培、西塞罗和布鲁图斯为首的“贵族派（optimates）”而最终实现的。当“人”与“多头兽”联合起来打败了“狮子”之后，和平与秩序终于重新降临了。不过，以这种方式重获和平的代价是罗马永远地失去了共和体制。随着大权逐渐聚集到“第一公民”手中，罗马实际上又变回到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历史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在塔昆被科利奥兰纳斯的同代人赶出城邦五百多年以后（事见《科》：II. 2. 87-95），一位国王又重新君临罗马。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奥古斯都在消灭安东尼后就已经掌控了国家，但其统治的正式纪年却是从公元前23年开始的。用以纪元的标志性事件是他被授予护民官的大权（其后的统治者都延续了这一做法）；^① 这就是说，罗马的皇权实际是在护民官权力的基础上统合其他一些权力而成的。就此而言，科利奥兰纳斯的时代既见证了旧君主制的终结，又目击了未来君主制的最初萌芽，而护民官这一“畜生般的平民的牧人（《科》：II. 1. 95）”最终也将成为罗马政治体中狮子和多头兽共同的“牧人”。

四

至此本文仍在用“君主制”、“共和制”等词汇来界定科利奥兰纳斯所处的历史时代，但在柏拉图的体系中，社会变迁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却是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的。具体而言，对应于早期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形态在柏拉图那里叫做“荣誉至上政体（timocracy）”^②，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爱荣誉”的元素在政治体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柏拉图看来，这种政体远逊于真正的贵族制或王政，但与社会随后必经的几个阶段（财阀制、民主制和僭主制）相比，它至少还保留着早先理想城邦的一些痕迹。

^① 详见 Cornelius Tacitus, *The Annals*, A. J. Woodman,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4, 其 361 页有关于“tribunician power”的说明。

^② Barbara L. Parker 曾提出过这一看法，see Barbara L. Parker, *Plato's Republic and Shakespeare's Rome*,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4, pp. 31-32, pp. 54-73.

“任何存在之物都会衰败”，因此即使最完美的政体也难逃变质的厄运，最后被等而下之的形式所取代。变质首先将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教育者长期背离正确的教育方针，理想国的统治阶级内部终将出现致命的分裂：较劣的那部分会把社会拉向“追逐财货”的道路，而较优的那部分则依然“趋向美德并竭力维护旧有的秩序”（《理想国》：547b）。这种分裂必然会导致剧烈的内斗，但由于双方均无压倒对方的优势，争端最终将以妥协获得解决。在妥协之下，早先政体中禁止统治阶级成员拥有财产的原则被废除了，土地和房产开始被分割占有，对物质的欲望开始不断蔓延和膨胀（未来财阀制的轮廓已隐约可见），而原来品性正直的城邦卫士也逐步蜕变成贪得无厌的逐利者。事实上，“卫士”一词此时已不再是统治精英的恰当称谓了：对于城邦的敌人来说他们仍是令人生畏的“猛兽”，但他们现在也开始让本该受到他们保护的平民害怕——平民原是他们“朋友和供养人”，如今却成了他们的奴仆；除了对敌作战，这些变了质的“卫士”现在还得“忙于防范这些被奴役的人”（《理》：547b - c）。

但另一方面，新政体还保留着旧体系的一些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城邦卫士依然不务“农业、手工劳动或其他生计”，而是专注于艰苦的体育和军事训练（《理》：547d）。不过与早先相比，新体系培养出来的战士对美德的理解会褊狭很多；在柏拉图看来，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开始怀疑和鄙视理性与智慧时，发生这种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上，由于担心智者多诈，此时城邦的精英已不像以前那样选择最有智慧的人即哲学家来做他们的王了；当他们挑选领袖时，他们宁愿拥戴“血气旺盛、心思简单、天生更适合作战而非和平的生活的人”（《理》：547d - e）。由这样的人来掌管国民教育，我们可以想见青年人将很难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他们肯定个个都会精通军事艺术，但在有益于灵魂和谐的“音乐和哲学”方面则难免会有严重缺失。届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会朝血气和武德方向倾斜，从而形成把美德的某一部分当做美德本身加以崇奉的局面，而这正是普鲁塔克在科利奥兰纳斯传记开头谈到过的情形：

教育和学习的最大益处是让粗野的天性受制于理性，从而使人变得文雅、礼貌。……但在当时的罗马，骁勇善战是最受尊崇的美德；罗马人把这种品质称作 Virtus，而这个词的本义就是美德（virtue），也就是说，在罗马

人看来，美德就是勇敢，勇敢成了所有美德的代名词。^①

勇敢被凌驾于其他美德之上意味着理性失去了它应有的权威，而理性一旦失位，对感官欲望的抑制也就减弱了，这将导致血气与感官欲望的恶斗，并为城邦政治重心的进一步下移——表现为政体继续退化为寡头财阀制、民主制和专制——打开通道。^②

由于城邦本质上就是放大的灵魂，因此柏拉图笔下的五种政体都各有反映其典型性格的代表人物。与荣誉至上政体对应的是“爱荣誉的人（timocratic man）”，这种人的特点是高傲、勇敢和易怒，他天生热爱荣名，因此会喜好那些有明确胜负之分的活动（如狩猎和竞技）。一般说来，他“对自己的奴仆很严厉”，但“对同僚、长官却十分温和恭顺”（《理》：548e）。由于所受的教育重武轻文，这种人“绝不长于演讲”。由于他生来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对自己统治他人的权利从不怀疑，但认为自己执政的资质在于“军事才能与赫赫战功”，而非在民众面前夸夸其谈的能力（《理》：549a）。在金钱方面，这类人在血气旺盛的青壮年期颇能抵御诱惑，但随着年龄增长血气衰弱，会变得“愈来愈爱财”——这是因为他们同其所代表的政体一样，“性格里有嗜财的倾向”，且灵魂中缺少理性的指引，无法保证老来不偏离美德的正道（《理》：549b）。

除上述特点外，柏拉图关于“爱荣誉的人”的一段描述还能为我们理解《科利奥兰纳斯》一剧主人公的性格形成提供一些重要线索；在解释荣誉至上政体下爱荣誉的性格是如何产生时，柏拉图特别强调了母亲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苏格拉底：譬如有个年轻人，他的父亲是个好人，但不幸生活在一个治理无方的城邦里。他因此不求荣誉、权力，也不卷入诉讼等一切是非，为了少惹麻烦他宁愿让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吃一些亏。

阿得曼托斯：那么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怎么变得爱荣誉了呢？

苏格拉底：他经常听母亲抱怨说，他的父亲无官无职，致使她在妇女群中也

① 前文提到的考密涅斯关于勇敢是“最值得崇敬的美德”的话就是从这段议论中化出的。引自 Philip Brockbank, ed., *Coriolanus*, London: Methuen, 1976, pp. 314–315。这段话与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对斯巴达制度的批评很近似，应有渊源关系。柏拉图的原话是：“就这些制度旨在培养公民美德而言，它们是值得赞许的；但它们只注重培养美德的一个方面而非整个的美德，就此而言，我对它们持强烈保留态度”（《法律篇》705d）。

② 柏拉图所谓的政体退化大致上是一个政治体重心不断从头脑向胸腹及以下移动的过程。荣誉至上政体的重心在胸腹，亦即由血气和感官欲望共同主导，而在更低等的民主和僭主制中，主导力量则更多的是欲望。关于理性、血气和欲望在人体中所处的位置，详见《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69–70页。

受到轻视；他不重钱财，与世无争，全神贯注于内心的思想，甚至对她也很淡漠……这一切都触怒了她，于是她对儿子讲，他的父亲没有男子气概、太过随和；另外还数落出一大堆缺点，都是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陈词滥调。（《理》：549c-d）

就这样，母亲在争夺儿子灵魂塑造权的斗争中战胜了在一切世俗事务上都甘于寂寞的父亲^①。有趣的是，父亲的缺失和母亲的强势也是一个对科利奥兰纳斯的性格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因素。与此同时，柏拉图的描述还揭示了母亲把儿子塑造成“爱荣誉的人”的心理动机——她被自己丈夫的籍籍无名所深深刺激，转而希望在儿子身上弥补这一缺憾。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一剧中并未正面触及伏伦妮娅的心理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的模型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揣测和想象的依据。^②就此而言，在《科利奥兰纳斯》中母子关系这一历来由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批评一统天下的领域里，柏拉图关于“荣誉至上”性格的理论也同样是颇有有用武之地的。

前文曾指出，科利奥兰纳斯的悲剧是深深植根于其性格之中的；而既然科利奥兰纳斯的性格就是新兴的罗马共和国的性格，那么归根到底我们也可以把这部作品看做是一个关于罗马共和国本身的悲剧——它的主角既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国家。

[作者简介] 陈雷，男，1972年生，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近期论文有《文森修公爵的“为政之道”——〈一报还一报〉中的道德哲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血气”的研究——从柏拉图哲学的角度看〈雅典的泰门〉》（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冯季庆

① 从柏拉图的描述看，这位父亲显然是一位哲学家（《理》：496d），代表着儿子灵魂中的理性因素（《理》：550b），因此他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理性权威的丧失。

② 伏伦妮娅似乎经常想象自己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神话人物赫丘利斯（Hercules）的妻子（《科》：IV.1.17），她言语中也经常把儿子与丈夫的身份互换，如“倘然我的儿子是我的丈夫”（《科》：I.3.2），“我以你妻子（I am in this your wife...）、你儿子以及这些元老的名义对你说这些话”（《科》：III.2.64-65）。